

第一章 绪论： 人类政治问题与人类政治生活的改善

从其性质上来说，我们人类的生活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生活。尽管思想家们说在人类早期的很长一个阶段，人类并没有国家没有法律 当然也就没有政府 也就无所谓政治生活 但是这样未开化的社会严格说来只能说是人类的“初级阶段”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社会。而且 对于现在的人类来说 我们已经无法脱离政治社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过着政治生活。然而 人类的政治生活绝对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其中始终存在着人类难以认识 从而也是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人类正是在不断寻求其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和途径的过程中，谋得政治生活的改善。

一、人是天生要过政治生活的“政治动物”

人生来就是一个“政治动物”注定是要过政治生活的。历经十月孕育，一朝投于尘间 新的政治生命降临我们这个社会 虽然他还无法自主选择，但却要面对由于他的到来而发生的一系列活动 尽管他对此一无所知。除了给予他生理上所必需的料理外 其父母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取名和申报户籍。取名使他获得了社会性的符号，户籍则使他获得了政治性的身份。户籍申报决定了他的国籍 同时也认同了他的公民身份。这样 他就在这个社会里享有了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并要在成年后对国家和社会尽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从此在他的生活中有了两种身份，一个是社会性的身份，一个是政治性的身份。十几年后 这个政治生命的

生活中又增添了无数复杂的内容。他最引为自豪的当然是他可以以成人的身份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真正涉入人类政治生活的领域。他开始思考世界热点问题 诸如地区冲突、联合国、国家领导人及地方领导人的更替等政治问题。他可能会加入地方性、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政治组织。在他的祖国 他既可以参加反对党 也可以参加参政党 当然如果有机会 他的党也可以成为执政党 而他本人有可能成为议会的议员、政党的领袖甚至是国家的总统、总理、首相或主席。假如他关注国际事务，他就会参与国际性的政治活动 小到地区政治问题 大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总之 在他的生活中，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由一个自然人长成为一个社会人，由一个生物人长成为一个政治人。

以上所描述的画面 并非我们的主观臆想 而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虽然并非人人都能成为总统或政党首脑，但从一出生开始 人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生命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特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这一蕴含真知的名言是对人的社会政治性的最精当的描述。公元前 6 世纪前后的希腊半岛 生活着高度组织化的古希腊人 他们以大大小小的城邦作为生存单位。“城邦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 是他们值得为之献身的最高利益。”当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城邦内或城邦间进行的 在当时人们的视野里 城邦就是一切 城邦就是求得生存 城邦是过上和谐和‘优良生活’的载体。城邦的宪法是一种“生活的模式”而不是一种法律结构。“人人都能积极参与共同生活 这种理想是以一种乐观的估计为前提的 即认为一般人都具有天赋的政治才能。”^① 所以古希腊的每个公民都必须生活在城邦里，过城邦生活。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人如果脱离城邦 不是鄙夫 就是超人。”^② 很显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动物’指的就是人的合群性、自觉的组织性和理性。

①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第 32~35 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第 7 页。

人类正是基于合群的本性，方从朦胧的群体，经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最后进入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的领域。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过群体、组织生活呢？人类过政治生活是必然的选择吗？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探讨一下政治的定义或政治生活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说明人们的社会政治性。有关政治的定义十分混乱，我们可以作如下简要的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是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是人们对社会价值的一种理想追求。中国圣哲孔子就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②。这里“正”和“政”就是中国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是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政治就是实现正义，为民谋利，以达到最高之“善业”为目的，而人只有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才能实现这种目标。

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是某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中国古代的“君权神授”、皇帝即天子的思想，“天下合一”、“天人感应”等观点都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在西方的中世纪，神学政治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国王是上帝的仆人”，没有任何权柄不是出于神的”^③。而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则把政治说成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国家是精神为自己创造的世界”^④。

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是权力现象，是对权力的运用和追求。中国先秦时代的法家就主张政治之道的主要内容应是法、术、势。韩非认为：“先王所期者利出，所用者力也。”^⑤近代西方政治学的鼻祖马基雅维利也认为：“政治就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

① 《论语·颜渊》。

② 《论语·泰伯》。

③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5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5页。

⑤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的总和。’^①

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德国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政治是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美国政治学家拉斯维尔也认为“政治是权力的形成和分配。’^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管理活动。我国早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孙中山先生曾就政治一词谈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政治这两个字 浅而言之 政就是众人的事 治就是管理 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③美国政治学家 G. 庞顿和 P. 吉尔也认为“政治活动可以被认为是与对人的集体生活的管理联系在一起的。”^④

不同的观点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都从一定的角度揭示了政治的某种特性。可以看出 从现代的意义上说 政治是人们围绕着特定的利益 借助社会公共权力 在对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总和。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政治生活来源于社会生活 又制约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最初的组织生活 在这种生活中诞生了人类的政治生活 而人类政治的首要特征就是组织性和群体性。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人类天生具有合群性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走上了高度组织性的政治社会，因此人类注定要过政治生活是一种必然。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我们看到：

首先，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第一动力。早在蒙昧时期 人类就已经掌握了同大自然抗衡的基本方法 但就单个人而言，谁也无法逾越大自然的蕃篱。当时人们对疾病、做梦、

马基雅维利，《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

② 拉斯维尔，《权力与社会》 转引自王浦劬，《政治学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 页。

《孙中山全集》(下)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第 561 页。

④ 庞顿等，《政治学导论》 转引自王浦劬，《政治学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5 页。

日出日落、风雨雷电、火山地震等一无所知。面对这些远远超出人的想象和感知的‘神秘’现象，人们充满着恐惧和迷茫。为了生存，早期的人类靠采摘植物果实生活，但这种生活方式无法保证长期的生活需要。火的发现使人们得以围猎周围的小动物，渐渐地人们在实践中学会了集体围猎的方法。弓箭的发明带来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样食物的来源进一步增多。在集体狩猎中，人们第一次懂得了组织力量的伟大，而且逐步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即只有在有领导能力和协调能力的人的带领下才能实现某种目的。最初的围猎是渗透着神秘意念的行为，每当大型狩猎开始前，就要进行占卜，这就使得从事占卜的人通常就成为围猎的领导者，享有一定的威望同时也享有一定的权力。这些最初的占卜者，后来一部分成为专司祭祀的人，一部分成为军事首领或部落首领。这样，人类的生活便逐步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分散走向集中，由无组织走向有组织，由一般的社会生活走向了政治生活。最初人们组成氏族议事会，通过议事会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关系，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外部保证。也正是这种组织化和群体性的生活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安全，避免了灾难。于是这样的生活被沿袭下来，成为人类区别动物界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方面。

第二，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是政治生活的基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政治现象都能在经济中找到原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

原始社会的公有经济决定了当时的原始民主制度，而当人类完成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社会第一次大分裂后，整个情形都发生了变化。随着剩余产品的产生并逐步增多以及交换的发展，特别是商人阶级的产生，人们的私有观念开始出现。氏族、部落的首领最初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代表整个氏族或部落对外进行交换。但这时开始在管理和交换的过程中把公物据为私有，以增加自己

的财富 这样便产生了最初的贫富分化 分化的加剧又导致了富有者群体同贫困者群体的对立。攫取财富的群体为了保住其财产，就设立法规 建立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 使其财富合法化。贫困者群体则竭力想维持旧有的财产平等以及政治民主的生活方式。在二者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一种崭新的政治组织——国家就产生了 从此人类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国家成了政治生活的核心。社会财富私有化的过程也就是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一旦从社会中脱离出来，一旦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权力，就必然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题。恩格斯在描述国家产生时指出：“国家是表示 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 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 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 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再次，权力和权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内容。人类最初的权威是来自同自然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那时人们不但惧怕自然界，而且还惧怕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现象。由于出现了能解释并说明这些现象的‘先知’他们便在氏族和部落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围猎、战争中有威望的‘先知’们率领人们战胜自然 掠取财富，又反过来巩固了他们的权威地位。这种原始权威最初靠习俗和道德来维护和传习，但更多的是依靠宗教。以基督教为例，在《圣经》中记载 上帝与摩西立‘约’通常称‘摩西十戒’就是用上帝赋予摩西的权威教化以色列人 让他们听从摩西的指导 团结守序 共渡难关 顺利逃出埃及 重返家园。国家以前的权威主要依靠原始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占卜和宗教的方式实施公共权力。而国家以降，政治权力便主要在国家的层面展开，由国家集中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166页。

使 并延续至今。

二、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演进

人类社会系统由许多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子系统构成 政治系统是其最重要的子系统之一。如果我们把经济子系统看作是物质和财富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的话,那么政治子系统则是对经济活动中生成的政治资源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过程。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政治活动、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均不能单独存在 它们与社会各个领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它们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生活主要反映人和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价值、利益关系 人们在其中追求着和善、良好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系统有自己的特征 有自己的变量和参量。通过这些变量和参量 我们可以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进行描述和界定。政治生活中的人当然首先是社会的人。在政治生活中,人们根据财富和社会地位而实现其角色分化和分层。各阶层间的利益不同导致政治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有对抗性的,又有非对抗性的。在冲突中实力雄厚的阶层借助政治统治形式对其他阶层实施政治统治,借助政治管理形式对整个社会进行政治管理。在某些政治条件下,社会阶层中处于被统治、被管理的阶层也通过某种规范的和非规范的渠道逐渐介入政治过程 参与政治活动 影响政治进程。

尽管人类的政治生活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极大多数时期,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 人类政治生活却有着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时间上说,人类政治生活穿越漫长的蒙昧时代,跨越悠久的古代文明 经由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形态 进入当代的全球化政治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生活方式经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一元到多元的发展。从空间上说 散居全球各地的人类都在人类文明的历时过程中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政治文明,有着

各具特色的政治生活方式。每一历史时代都有主导的政治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那一时代的人类政治文明的水平。

要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演进过程作出清晰准确的描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子系统交互作用所表现出的动态过程。任何后人的分析和描述，不管是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穷尽其全貌，只能窥其大端。然而，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演进作一粗略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为改善政治生活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1. 前国家时期的政治生活

严格地说，或者从现代人们的一般观念来看，前国家时期实在也谈不上什么政治生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政治生活。但是从人的群体性特征来看，只要有人群，人类就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分析这一时期的人类政治生活的。

我们把从人类形成到国家出现的漫长时期称作前国家时期，从时间上说，约从 10 万年前到公元前 700 年。实际上，世界不同地区国家的产生相距甚远，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就建立了国家，埃及人于公元前 3100 年前后，印度人于公元前 2500 年前后，中国人在约公元前 2100 年也建立了国家，而古希腊各城邦的建立是在公元前 800 年前后。从空间上说，这样的形态包括了世界各地国家出现前的人类生活状态。

前国家时期的野蛮时代，人类尚处在生物状态，单个的人类个体无法抗拒自然以满足自我生存的需要，本能促使他们彼此结合起来，组成群体。在简单的由本能而形成的群体组织中，人类的力量得以壮大，个体得以保护，食物来源有所扩大。在长期的群居生活中，人们进一步领悟到组织力量的伟大，合群性进一步增强，并一代一代传习下来。在人类早期的群体中，基于种的繁衍，人们建立家庭，在家庭的基础上形成氏族。氏族是人类最早的组织形式，人类的生活在氏族里展开，它不仅涵盖了物质生活，而且涵盖了精

神生活。在氏族生活中，人们形成了习俗、信仰、崇拜和对群体生活的关心，并最终形成独立于人之外又制约着人的行动的“公共权威”。但直到氏族的公共权力机构——氏族议事会——形成并固定下来，氏族首领更替实现了制度化，群体生活逐渐摆脱生物形态，形成了有一定秩序和权威的社会实体时，人类才最终迈进政治生活的门槛。

国家出现以前，人类经过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组织形态，在这个被摩尔称之为又被恩格斯肯定的所谓野蛮时代里，人类政治生活方式表现出单一性、单调性和原始性的特点。政治生活的目标单一，政治生活的模式单调，政治生活的内容也枯燥。所谓目标的单一，主要是说野蛮时代的人类政治生活所追求的仅仅是维持自身的生存，以满足生物意义上的需要，并不关心政治生活的质量，政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生存服务的。所谓模式的单一，主要是说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政治模式不外乎议事大会、部落首领、军事首领、祭祀活动等等。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只有传统意义上的统辖，没有规范的政治统治，只有社会的一般道德规范，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所谓政治生活的内容单调，是说不论是在氏族社会，还是在部落社会，人们政治生活的内容不过是协调产品的分配，组织采集、狩猎和种植养殖活动等农业活动，在部落冲突中，主要是如何运用战争和非战争手段击败对方以及日常的祭祀和一些宗教性的活动。野蛮时代人们在这种经久不变的模式中延续政治生活。尽管原始政治生活单调，但原始人的政治生活中却包含着文明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民主、自由、平等。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这类现代人所经常使用到的政治概念，但是现代人的这些概念不能不说是从祖先那里总结出来的。政治参与几乎包容了每一位成年人，大家以平等的身份介入政治生活的空间。在野蛮时代的人类政治生活中，没有当代政治的罪恶，人类最初的善和正义一直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原始人的政治生活中没有财产的私有，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等级观念，人人平等，人们只信仰“神”。

灵”或者说在神灵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获得了自由，没有社会对人的束缚。由于原始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由此决定原始的生产关系的水平也相当简单。“与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原始社会人类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原始民主制”^①。政治生活中充满了原始民主的气氛，大家对权威的选择是基于信仰和信任。当然，原始人的政治生活中也充满了争斗、仇杀和战争，但这些极端的冲突形式多发生在共同体之间。

2. 古典伦理——神权国家取向的政治生活

国家以降人类政治生活空间进一步拓展，并以国家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国家的起源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分裂为经济和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但国家一旦形成，就表现出它自己的特性。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国家首先是按地缘来划分居民的，其次，国家设有“特殊的公共权力”，再次，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最后，经济上的不平等始终是国家中政治不平等的根源。但是，国家就其存在的方式来说，它是一种凌驾社会之上的力量，是一种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分离的力量，它以人类共同体的形式而存在。“国家”一词可以指一种历史实体或一种哲学思想，一种人类共同体的持久形式或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国家等同于政治实体或政治共同体，这类实体或共同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整个历史长河之中，其发展演变一直是历史科学的中心论题。同时，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也自然有一些超越时空的一般特性，如它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历史表明它是强加于人的必然。自从有了国家，人类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各自的影子。

作为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一个现代的每一个人所须臾不可离开的概念，国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玩

意儿”又为什么会降临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人类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搞清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人类受制于“神”的统治，相信国家这东西是神的意志或者说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为了统辖人类而特意设计的世俗组织。这时候，神权是唯一超出国家之外的权力，所以我们把古代国家称作伦理—神权国家。伦理—神权国家是相对于近代民族国家的理性国家而言的。从时间上说，这是一种从国家诞生到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前的国家形态。从空间上说，世界各地民族国家形成以前似乎均有这样的国家形态。古希腊的城邦、古罗马的共和国以及中世纪的“王国”、古代中国的封建帝国，都有伦理—神权国家的某种形态。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伦理—神权政治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在古希腊人的城邦形态下，每一城邦都有尊奉的神祇。古希腊人在政治生活中最关心的是“如何过好城邦生活”如何在政治生活中实现“善”和“正义”，而实现这样的“善”和“正义”必须使所有的政治生活都在诸神的“庇护”下进行，以承认和维护“神”对国家的控制和约束为前提。任何政治生活都要符合“神”的旨意，而不得有所违背。古罗马的公民社会由罗马法的严密体系支撑，在古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法律体系日臻完善，它为西方法学世界观和法治国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在古罗马的法律分类中，自然法就是自然和上帝的理性，是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正义。在本质上，自然法就是神法，而自然法的制定者就是上帝，即使不是由上帝直接制定，也是直接来源于上帝的意旨。

伦理—神权国家最典型的形态是西欧中世纪的王国。在这些王国中，基督教占据特殊的地位。大约到10世纪末，基督教神学成为西方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形成了政治依附于神权、政治生活宗教化、神权高于俗权、皇权高于主权以及教会高于国家的社会架构。曾一度时，国家的宗教神秘化色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从有文字记载的夏、商王朝起，一直到20世纪初的清王朝，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神权下的伦理国家形

态。从夏、商到周王朝，中国人就认为统治世界的是上天，天子是上天的代表，是世俗民群和上天的中介，天子的权力由上天授予，而天人是统一的，只有顺应天子，才能达到天人一致。这一思想经秦汉思想家的整饬之后，成为统治中国 2000 多年的政治生活观。尽管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儒家的伦理说教和法家的法治国思想，但这一切都是从属于“君权神授”这一神权国家统治的基本事实的。

伦理 - 神权国家下的政治分野日见明显。在奴隶占有制国家中，奴隶主和宗教职业者成为统治阶级，而奴隶和自由民是被统治阶级，奴隶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妇女没有政治地位，她们和奴隶一起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在封建贵族国家中，封建主和宗教职业者是统治阶级，农民、农奴和自由民是被统治阶级，农民、农奴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在这样的国家中，照例农民、农奴和妇女也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政治活动成了统治者的私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欧洲，从远古以来就是君主和大臣们从事的活动，历史主要描述的是他们的业绩。

在伦理 - 神权国家形态下，国家通常实行王位世袭制，而各封侯与领地也是层层分封，永世永袭。只有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实行的是王位选任制，国王或执政官由公民选举产生。在神权国家形态下，宗教和国家的关系、教权和俗权的关系一直影响着政治生活的主要倾向和基本内容。在古希腊，虽然政治活动是在宗教的包容下进行的，但宗教不直接干涉政治，所以就不存在教权、俗权之争。而在西欧中世纪，宗教和国家的关系、教权和俗权的关系一直是贯穿政治生活的始终。两者时隐时现，时上时下，经过较量，教权战胜王权，教会高于国家，最极端的形态就是公元 10 世纪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在神权国家形态下，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官僚级制度。这一制度一方面是为神权国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又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渠道和模式。

3. 近代民族国家取向的政治生活

近代民族国家是国家形态从而也是人类政治生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飞跃，这一飞跃进一步拓展了政治生活的空间。它是在封建中世纪王国的消亡中形成，可以 16 世纪作为分期的大致界限。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宗教改革运动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神权国家一方面以某种方式日逐分裂，另一方面又以另一种方式走向统一。在这种运动组合中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在民族的基础上又建立了近代国家。近代国家一俟形成就以不可阻挡的势力向全球蔓延，征服和扫荡神权形态的国家，把近代民族精神洒向全球。在民族国家形态下，世界开始走向统一，各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合作又加速了统一过程。同时各国之间的主权分野更显突兀。政治生活中首次出现了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

民族可以界定为一种名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它通常有着一个共同的祖先、历史传统和划一大众文化的神话，占据有一块领土，所有成员都有劳动分工和法定权利，其中包括种族文化因素和现代“公民”特征^①。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家和民族的结合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国家这一要素在此是指理性国家，它形成于西方现代初期，是一种自立于其他制度之外的、独特的、集权的社会制度，并且在已经界定和得到承认的领土内，拥有强制和获取的垄断权力。在一个国家里，民族的公民要素和领土要素越明显，它同民族的结合就越容易；反之，一个国家中种族要素越明显，它同民族的结合就越难。国家疆界和民族聚居区域一致时，形成单一民族国家。然而绝大多数所谓民族国家是一种多民族的混合体，在一个国家的疆域上居住着许多民族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同一民族的人们散居于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现象也极常见。当今世界上

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90 页。

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只占少数。所以当前的国家在形态上仍是民族国家取向的形态。近代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民族和国家结合的过程，同时是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

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有着必然的联系。民族的形成 民族国家的建立 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 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成果。民族国家的建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 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开道。因此 民族国家在整个文明世界构成了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所以，近代国家和民族的结合以致形成民族国家，使国家在人类进程中逐步摆脱了伦理—神权的干扰 实现了宗教和国家政治的分离 使宗教逐步退出了世俗权力的世界。民族作为国家的基本因素或基本特征 这一发展带来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 以往被神权压抑的国家被民族的涉入所取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在民族国家中 社会的政治分野十分明显。这时候 资本的观念、价值的观念已深入公民的内心深处。人们基于对财富和资本的占有不同而分成资产者、无产者、小私有资产者等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种社会分层下，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政治冲突构成了国内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而资产者同小私有资产者的冲突也是社会冲突的一部分。由资产者构成的统治阶级一方面对被统治阶级实施阶级统治，另一方面对民族国家实施公共管理。为了缓解冲突 统治者对公民的政治参与一方面加以限制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扩大国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以满足人们政治生活的某种需要。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和广泛性上。以往政治是贵族和有产者的专利，而在近代民族国家，政治则走向民间，趋向公开。普选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新的内容，而且普选权也随民族国家的成熟和完善走向深入。民族国家中另一参与扩大的现象是妇女参与政治活动。最初妇女的政治生活是极其少量的和不经常的，随着妇女解放程度的提高以及女权运动的深入，到 20 世纪 妇女对

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性别和政治的关系日益受到人们的注意。在社会分层下，有共同利益的人组织成群体，政党和政治社团是民族国家形态下的壮丽景观。现代政党是某一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中的政治领导集体，政党有特定的目标和纲领，有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纪律要求。从本质上说，政党有鲜明的阶级性。政党通过其集体性的政治活动介入政治生活。在近代民族国家中，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与政党现象相似，政治社团也是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政治现象，这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政治社团以工会、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以及利益集团、压力集团、院外集团、公共社团等等的形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社团往往起到组织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作用，但在特定条件下，政治社团可以上升为政党，以政党的组织形式投入政治生活。

在近代民族国家中，政治的运作趋于规范，政治资源的分配也越来越多地渗透了市场经济的因素和规则。譬如说，这时候政治官职不再成为一种被垄断的政治资源，政治领导人的更替往往较多地采用选任制的形式，和平竞选是政治官员更替的主要手段。当然，在极端情况下，由革命手段实现政权的更替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在近代民族国家中，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使政治生活得以在规范中运行。由层层相联的政治官僚和行政官僚制定政治规则，并指导政治生活。同时，官僚阶级本身也有其特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规则和体制，这种官僚体制为现代政治的规范性特征提供了依据，使人类的政治生活日益成熟和固定化。然而官僚制度也为现代政治带来了副产品——官僚主义现象，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官僚主义，官僚政治现象却始终是近代民族国家存在的重要政治现象。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官僚主义的解释从来就是多元化的，但是官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一种官民的对立关系。这种官民的对立关系直接渗透到人类的政治生活之中。

民族精神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族精神是民族共同体在一定的经济生活中，经由民族的冲突和重建过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民族认同感。它使一个民族的个体成员对本民族产生精神上、政治上的归属意识。这种归属意识类似于人们对于某一宗教的关系，与归属于某一宗教的情况一样，民族的人群是依据民族的某种精神特质来划分的。民族精神促成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带来了民族征服和殖民主义。近代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民族征服，一方面给世界其他民族带来了灾难，但同时也毫无疑问地从外部为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的结果是民族国家形态成为全球取向的模式。

4. 当代全球化取向的政治生活

究其源头，全球化的取向始于 15 世纪末 经由约 500 年的发展 全球化的特征已日益明显。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名著《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 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 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 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 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的原料 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 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全球化推进的标志一般认为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的趋向侵蚀了民族国家的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第 254、255 页。

界渗透到人类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以往以民族国家为取向的国家形态。在全球化的推进中，具有某种世界性政府特征的国际组织以及地区国家联合体得以生成。民族主权国家的纯洁性和封闭度逐步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政治实体间的实质分野线日渐模糊，各实体在互相渗透中日益溶合，然而各实体的相互依存度同时也在增加，过去那种“非我即你”、“你得我失或我得你失”的“零和”意义上的博弈已不存在或很少存在。全球形态的“非零和”博弈模式日显重要。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人类的政治生活跨进了全球政治时代。在这个地球上，尽管国家利益的概念依然是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主要根据，但是人类毕竟第一次拥有了共同的利益，并在新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了全球化的政治系统。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各国的国内政治也日益出现全球趋向的特征，开始吸收全球政治的养料和成分，因为各国的政治生活都是全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世界各国，都是全球政治的成员。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在这种全球化的趋向中过着无法完全摆脱全球化影响的政治生活。

人们认定今天的世界是全球化时代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实体多元化的存在。传统的政治实体在国际上主要是民族国家，而今天除民族国家外，出现了不同的政治主体。世界性政党、全球性国际组织、地区性政党和国际组织都是主要的政治主体。人类通过这些国际国内的政治主体来充实自己的政治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国际社会，这样的过程还有加强的趋势。

在国家的内部，各政治结构都或多或少地同国际发生着联系。各国的政党在从事政治活动中，不仅要注重国内政治，而且要注意国家间政治和国外政治，并同国外的政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团体或个人保持接触和联系。

全球化时代，政治分野已表现出某种全球化的特征。这种分野一方面是全球实力强大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对落后的国家或政治实体的控制和占有，另一方面在国家或政治实体的内部也照例存